

Études de Philosophie Française

莫伟民——主编



点评法国最近那些哲学争论
关于法国最近那些哲学争论的对话
论“社会契约”
医院之并入现代技术
语言与亲近
超越历史：书籍和智慧者的终结
福柯、海德格尔与古希腊

[法] 马里翁
马里翁 莫伟民 游淙祺
[法] 阿尔都塞
[法] 福柯
[法] 列维纳斯
[法] 卡尔维刚
[法] 卡桑

中法视角

法国哲学研究

第二辑

目录

马里翁专栏 / Jean-Luc Marion

- 3 [法] 让-吕克·马里翁 邵奇慧 译 莫伟民 校
点评法国最近那些哲学争论
- 23 [法] 让-吕克·马里翁 莫伟民 游淙祺 等
关于法国最近那些哲学争论的对话

笛卡尔专栏 / René Descartes

- 43 [法] 文森特·卡罗 陈东兴 译
“我”(le moi)是谁?
- 72 张小星 笛卡尔、清楚明晰与意志自由
- 81 陈东兴 重读笛卡尔“第六沉思”中关于物质实体存在的论证
- 99 姜 涛 笛卡尔沉思与因果性概念辨析
- 121 谢 勇 论笛卡尔《第一哲学沉思集》上帝观念中的“现实”
概念

列维纳斯专栏 / Emmanuel Lévinas

- 139 [法] 伊曼纽尔·列维纳斯 周轩宇 译
语言与亲近

笛卡尔、清楚明晰与意志自由

张小星^①

许多学者以理智决定论解释笛卡尔，认为在当下“清楚明晰”的认知面前，沉思者并没有判断的自由。Anthony Kenny 尤其指出，如果沉思者能够对当下清楚明晰的观念悬置判断或拒绝，则笛卡尔追寻确定性的框架将完全坍塌。通过重新解释“不可怀疑”“确定性”及“认知辩护”等概念，我们将会支持 Kenny 的解释并不成功。判断的自由和笛卡尔确定性是两个独立的议题。

一、引言：笛卡尔与理智决定论

在 20 世纪的哲学语境里，“自由意志”的首要威胁来自物理决定论。如果我们每个行动都从物理层面被事先确定，我们如何能有真正的自由？对自由意志的“捍卫”，除自由本身的价值外，还基于自由意志在现象经验层面的证据：当没有外力限制时，我如果想喝水，就会伸手去拿水杯；若我想散步，就能起身迈步。笛卡尔就曾指出，没有什么比意志自由更加明显（AT VIII-a: 20）^②。不过，对于笛卡尔，自由的首要威胁并不是物理规律，而是清楚明晰的认识。

清楚明晰属于“认知”属性，它如何跟自由发生关联呢？根据笛卡尔的第三沉思中，“我思”“我在”之不可怀疑，“仅在于”它们的清楚明晰（*nihil aliud est, quàm*, AT VII: 35）。而如果把“我思”的不可怀疑性解释为我们“无法”

① 作者为巴黎索邦大学哲学博士，云南大学教师。

② 本文引用笛卡尔的参考版本为 AT = *Œuvres Complètes*, eds. C.Adam and P.Tannery, 11 volumes, Paris: Vrin-CNRS, 1964—1975。

拒绝承认其为真，则当沉思者对“我思”具有清楚明晰的认知时，也就不得不认其为真。换言之，在清楚明晰的认知面前，沉思者将没有判断的自由。

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，我们需要区分自愿和自由。一个行为是自愿的 (voluntary)，当且仅当它由行为者的意愿所产生；而一个行为是自由的 (free)，当且仅当行为者有其他选择、且原本能够做出不同的事情 (could have done otherwise)。在日常语境下，这两者常彼此重合。如果没有任何外力施压，让我在 A、B 两个选项中进行选择时，则我做出的任何选择都可以自愿且自由。自由，因为没有外力限制，于是我无论事实上选择了哪一个，都“本可以”选择另外一个；自愿，因为在不受强迫的时候，我的选择完全是根据意愿做出的。不过，自愿和自由往往只在日常语境下重叠。如果更严格的审视，就会发现两者彼此独立。一方面，在决定论的世界里，我每一刻产生怎样的意愿已被确定。比如，我在时刻 T “想散步”，于是散步；而既然我“想散步”的意愿被物理规律决定，我随之而来的散步行为，也就被物理规律决定。即，对于是否散步，我其实完全没有其他选择。在这个例子中，我的行为自愿，但不自由。另一方面，假设世界不是决定论的，且假设我在某个时刻 T* 的行为有不同选择的可能。如果这时，我出于道德或经济的原因，做出了一个不太心甘情愿的选择——比如，在两个商品中购买了便宜的、性价比也不高的——则我的行为尽管自由，却非自愿。

无论我们用以区分自愿和自由的这两类场景最终是否成立，它们都提示了自愿和自由之间的差别。回到笛卡尔。我们现在可以更加准确的说：清楚明晰的认知对判断自由的“剥夺”，是指我们没有做出不同判断的可能性。然而，此时的判断完全是自愿的。当清楚明晰的思考“ $2 + 3 = 5$ ”时，我们不自由的原因无非：这个命题太简单、太明显，我们会产生极强的意愿去相信。正如笛卡尔指出的：理性越清晰，判断的意愿也就越强 (ex magnâ luce in intellectu magna consequuta est propensio in voluntate, AT VII: 59)。清楚明晰的认知决定我们的判断、让我们“无法拒绝”，这是理智决定论 (intellectual determinism) 的核心命题。

笛卡尔本人究竟是否支持理智决定论？答案并不明显。至少，笛卡尔曾

反复强调自由对意愿的重要性。在1645年写给梅斯朗（Mesland）的信中，笛卡尔讲道：

我不否认意愿具有这种积极的功能。事实上，我认为意愿的自由不限于那些模棱两可的情形，也适用于其他情况。因此，当理智给提供了非常明确的支持某观点的理由时，尽管我们在常规意义上（*moraliter loquendo*）难以抗拒，严格来说（*absolutè*）我们可以。（AT IV: 173，作者译）

《哲学原理》也明确提出了意志自由的观点：

按意愿行事——即自由行事——是人所具有的至高完美。人由此以非常独特的方式成为自己行动的作者，并因而值得赞扬。我们不会赞扬精确运行的机器，因为它们的行动已被设计好、必然发生……同理，当我们通过自由求得真理，要比我们只能如此时（*quam si non possemus non amplecti*）更值得称赞。（AT VIII-a: 19，作者译）

而在《沉思集》中，意愿被认为是最接近上帝的官能。作为人类，我们的智力有限，想象力有限，但判断的官能却无限：

（上帝的意愿）就其自身来看，并不比我的意愿更强大。（AT VII: 57，作者译）

显然，上帝如果在理智的清楚明晰面前居然没有判断的自由，就很难被认为是“全能”的^①。

① 关于笛卡尔意志自由的观点，参考 Ferdinand Alquié, *La découverte métaphysique de l'homme chez descartes*,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, 1966, pp.285—292; Peter A.Schouls, *Descartes and the enlightenment*, McGill-Queen's Press, 1989, p.xl; Jean Laporte, "La liberté selon descartes", *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*, vol.44, 1937, n°1; C.P.Ragland, "Is descartes a libertarian?", in Daniel Garber et Steven M.Nadler (dir.), *Oxford studies in early modern philosophy*,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6。

尽管如此，自由意志和清楚明晰是否相融，笛卡尔的研究者们莫衷一是^①。在安东尼·肯尼（Anthony Kenny）看来，清楚明晰认知的意义正在于它们“无法”被怀疑；如果清楚明晰的认知居然可以被怀疑，笛卡尔就会重新失去确定性的基础；于是，对于清楚明晰的观念，我们“只能”接受。本文将对肯尼的观点提出反驳。通过分析“不可错”、“不可怀疑”及“辩护”等概念，我们将会指出：从追寻确定性的角度看，笛卡尔式的清楚明晰并不对判断行为构成任何约束。

二、肯尼、清楚明晰与判断

我们刚刚指出，如果把“我思”等基础认知的确定性理解为“无法怀疑”，则理智决定论将是确定性的必然结论。即，当沉思者具有清楚明晰的认知时，他只有“无法怀疑”，才可能获得笛卡尔式的确定性。反之，若沉思者此时仍有判断的自由，并有能力拒不接受，“我思”也就将不再“不可怀疑”。这也是肯尼以理智决定论解释笛卡尔的原因：

清楚明晰的要义即“不可怀疑”——无论我们怎样尝试行使自由判断的能力；追寻真理的唯一方法就是依附于清楚明晰的认知；而寻找清楚明晰的唯一方法就是极端怀疑，直至无法怀疑。然而，如果我们面对当下清楚明晰的认知时还能怀疑，我们将失去所有的确定性，并重新陷入第一沉思的泥潭之中^②。（作者译）

为更好理解肯尼的论点，需要首先澄清：清楚明晰的认知，只有在它们存在

^① 关于理智决定论对自由的威胁，见 Anthony Kenny, “Descartes on the will”, in John Cottingham (dir.), *Descartes*,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98; Thomas M.Lennon, “Descartes’s supposed libertarianism: Letter to mesland or memorandum concerning petau?”, *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*, vol.51, 2013, n°2; Georges Dicker, *Descartes: An analytical and historical introduction*,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, 2013, pp.195—197.

^② Kenny, “Descartes on the will”, in Cottingham (ed.) *Descartes*,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98, p.157.

的“当下”，才有可能构成对判断力的约束。我不得不承认“ $2 + 3 = 5$ ”或“我思”，仅当我“正在”通过理性直观到它们的瞬间。一旦我转移了注意力，忘记了它们“为什么”成立，也就可以恰当的怀疑它们为假。哪怕我在回忆中把“ $2 + 3 = 5$ ”和“我思”视作“我当时清楚明晰认知过的”，这一标签本身也无法保证它们的确定性。

这样强化之后的理智决定论似乎十分可信。诚然，我们通常能够怀疑那些当下未必清楚的对象；也能怀疑曾经清楚认知过、但在记忆中变得模糊的内容。不过，我们真的能怀疑“当下”清楚明晰的认知吗？在我们理性直观“ $2 + 3 = 5$ ”的时候，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怀疑它？

当下清楚明晰的认知是否能够被怀疑，是笛卡尔文本解释中的关键问题之一。肯尼所持有的当下清楚明晰不可怀疑的理论，称为怀疑的弱解释（weak interpretation）。这似乎也是人们在反思“ $2 + 3 = 5$ ”及“我思”等简单命题时最自然的态度^①。与之相对，怀疑的强解释（strong interpretation）则认为，哪怕面对当下清楚明晰的对象，我们依然可以怀疑。例如，阿兰·格沃思（Alain Gewirth）将清楚明晰解释为相信对象为真的心理冲动（psychological compulsion）^②，而心理冲动并不确保真理。费迪南·阿尔基埃（Ferdinand Alquié）则诉诸笛卡尔关于上帝创造永恒真理的学说——如果数学也是全能上帝的造物，则上帝可以让我清楚明晰的数学知识为假^③。

肯尼对理智决定论的坚持似乎源于他对怀疑强解释的抵制。既然清楚明晰是沉思者视角下唯一可信的求真标准，则这个标准一旦失效，理性就不再享有任何支持。实际上，这也正是格沃思心理学强解释的困境：如果清楚明晰仅仅是某种心理特征，那么沉思者将永远无法超出心理的界限。哪怕他论

① 怀疑的弱解释，参考 Anthony Kenny, “The cartesian circle and the eternal truths”, *Journal of Philosophy*, vol.67, 1970, n°19; Etienne Gilson, *Les études sur le rôle de la pensée médiévale dans la formation du système cartésien*, Paris, Vrin, 1930, p.237; Samuel C.Rickless, “The cartesian fallacy fallacy”, *Nous*, vol.39, 2005, n°2; Michael Della Rocca, “Descartes, the cartesian circle, and epistemology without god”, *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*, vol.70, 2005, n°1。

② Alan Gewirth, “The cartesian circle”, *Philosophical Review*, vol.50, 1941, n°4。

③ Ferdinand Alquié, *Leçon sur descartes: Science et métaphysique chez descartes*, Paris, Edition de La Table Ronde, 2005, p.77, p.121。

证了上帝存在，也仅仅获得了心理上确定的结论^①。

本文不会深究强—弱解释间的争论，因为怀疑的范围和意志自由是两个彼此独立的议题。肯尼错误，恰在于将两者进行了不必要的捆绑。

三、怀疑的行为与怀疑的理由

为说明判断的自由和怀疑之间的关系，让我们思考如下情形：

假设某行为主体 S 的神经系统被科学家精密的控制，使得每当 S 想到“我会打篮球”时，都无法产生怀疑的念头。不过，S 并不会打篮球，他也没有任何接触篮球的记忆。他对“我会打篮球”的不怀疑，完全来自每当想到这个命题时，科学家对其神经系统的控制。

无论控制命题态度的技术是否可以实现，上述场景都是逻辑一致且可设想的。我们的问题是：S 无法怀疑“我会打篮球”，但他对自己会打篮球真的具有笛卡尔式的确定性吗？答案应当是否定的。笛卡尔所追求的确定性，其基本前提是对象为真；然而 S 并不会打篮球。

我们因此需要区分：

- a. 作为实际心理行为的怀疑
- b. 针对认知辩护程度而存在的怀疑的理由

所谓 S 对自己会打篮球的不可怀疑，是指他无法从行为上——无论身体的还是心理的——对“我会打篮球”提出质疑。然而，因为他其实不会打篮球，也没有任何接触篮球的记忆，所以他对自己会打篮球并没有认知辩护（epistemic justification）。换言之，S 有足够的“理由”去怀疑自己的球技。

^① 见 Janet Broughton, “Skepticism and the cartesian circle”, *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*, vol.14, 1984, n°4, pp.600—604; James Van Cleve, “Foundationalism, epistemic principles, and the cartesian circle”, *The Philosophical Review*, vol.88, 1979, n°1. pp.60—61; Rocca, “Descartes, the cartesian circle, and epistemology without god”, *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*, 70, 2005, pp.3—6。

笛卡尔在《沉思集》的开篇就明确提出，要审视自己的认知基础，并询问对它们是否有“怀疑的理由”(rationam dubitandi, AT VII: 18)。即，尽管怀疑最终会落到“悬置判断”这一行为，也总要基于恰当的原因——否则，任何人都可以毫无理由的“怀疑”任何命题。实际上，这正是第一沉思中极端怀疑展开的过程：对远处及微小事物的感知遭到怀疑，因为沉思者可能正经历幻觉或错觉；对近处事物及自身状态的感知不再确定，因为沉思者无法排除梦境的可能性；而数学运算、物理的存在本身被悬置，因为可能有魔鬼在骗我。每一次怀疑的推进，都是源于沉思者想到了某种场景，使自己相关的知识来源显得不再可靠。错觉，是怀疑远处和微小事物的理由；梦境，是怀疑近处事物及自身状态的理由；魔鬼，是怀疑数学（以及一切）的理由。

那么什么又是清楚明晰的认知？无非：对象的内容极其清楚、极其透明，沉思者找不到任何理由去怀疑它们。“我思”清楚明晰、不可怀疑，恰恰因为“我在思考”这件事——每当被我提及或想到时——都太清楚、太简单，它不可能出错，沉思者也就没有合理的怀疑空间。

行为和理由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？通常，人们会在行为上“相信”自己认知理由所支持的内容。当我看到天在下雨，并因此获得“天在下雨”的认知辩护，我也会同时从判断行为上相信天在下雨。笛卡尔的怀疑过程并未破坏这种关联。尽管沉思者看到了远处的景物，并因此获得了相应的认知辩护，但他对“错觉”的反思提供了新的语境，并由此瓦解了之前的认知辩护；在失去对远处景物认知辩护的同时，沉思者也相应的怀疑、或悬置了判断。

然而，认知辩护未必总伴随着相应的判断行为。的确，当我看到天在下雨，并获得关于“下雨”的认知辩护时，我通常会相信“天在下雨”，未必非要如此。我完全可以看到下雨，但不做任何关于下雨的判断。不做判断，或许不够理性，但理性的约束仅仅是“规范性”的——即当我看到下雨时，我“应该”相信天在下雨——而规范性并不蕴含事实。伦理的规范性类似，当我看到有人受伤时，我“应该”施以援助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根本“无法”默默的离开。既然认知辩护和判断行为之间可以彼此独立，清楚明晰也

就不能影响判断的自由。

现在，我们可以更加精确的定位肯尼的误解。在之前的引文中，肯尼写道“寻找清楚明晰的唯一方法就是极端怀疑，直至无法怀疑”。据此，肯尼似乎并不认为“当下的清楚明晰”具有独立的认知辩护意义。相反，清楚明晰仅仅通过“不能怀疑”的标准而产生。根据这种解释，“怀疑”——“不可怀疑”的范畴先于“清楚明晰”等认知辩护而存在，它们比后者更加基础。即，能被怀疑的就不确定，而不可怀疑的就清楚明晰。但这样一来，肯尼就无法解释“为什么”沉思者无法怀疑“我思”。如果认知对象的可怀疑性仅仅取决于怀疑本身——而非相关的认知辩护——则肯尼将没有任何理由说明为什么感知可怀疑，而“我思”却不可怀疑。肯尼唯一的出路，是重新诉诸“我思”的“清楚明晰”。可惜，因为“清楚明晰”的标准无非“不可怀疑”，肯尼也就会陷入恶性循环：清楚明晰，因为不可怀疑；不可怀疑，因为清楚明晰……

四、小 结

我们区分了怀疑的行为与怀疑的理由，后者与“清楚明晰”同属认知辩护的范畴。由此，无论我们在判断行为上选择接受、拒绝，或是悬置判断，都不会从根本上直接影响“清楚明晰”的辩护力量。相应的，清楚明晰的认知，也就不对判断行为构成实质上的限制。诚然，理智决定论的支持者也许能找到额外的理由。但无论怎样，将这一立场和笛卡尔确定性本身进行捆绑的策略并不成功。

参考文献

Ferdinand Alquié, *La découverte métaphysique de l'homme chez descartes*,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, 1966.

Ferdinand Alquié, *Leçon sur descartes: Science et métaphysique chez*

descartes, Paris, Edition de La Table Ronde, 2005.

Janet Broughton, "Skepticism and the cartesian circle", *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*, vol.14, 1984, n°4.

Georges Dicker, *Descartes: An analytical and historical introduction*,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, 2013.

Alan Gewirth, "The cartesian circle", *Philosophical Review*, vol.50, 1941, n°4.

Etienne Gilson, *Les études sur le rôle de la pensée médiévale dans la formation du système cartésien*, Paris, Vrin, 1930.

Anthony Kenny, "The cartesian circle and the eternal truths", *Journal of Philosophy*, vol.67, 1970, n°19.

Anthony Kenny, "Descartes on the will", in John Cottingham (dir.), *Descartes*,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98.

Jean Laporte, "La liberté selon descartes", *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*, vol.44, 1937, n°1.

Thomas M.Lennon, "Descartes's supposed libertarianism: Letter to mesland or memorandum concerning petau?", *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*, vol.51, 2013, n°2.

C.P.Ragland, "Is descartes a libertarian?", in Daniel Garber et Steven M.Nadler (dir.), *Oxford studies in early modern philosophy*,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6.

Samuel C.Rickless, "The cartesian fallacy fallacy", *Nous*, vol.39, 2005, n°2.

Michael Della Rocca, "Descartes, the cartesian circle, and epistemology without god", *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*, vol.70, 2005, n°1.

Peter A. Schouls, *Descartes and the enlightenment*, McGill-Queen's Press, 1989.

James Van Cleve, "Foundationalism, epistemic principles, and the cartesian circle", *The Philosophical Review*, vol.88, 1979, n°1.